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张根生）

逮捕“四人帮”的行动和情况（汪东兴）

我负责一个行动小组抓江青（张耀祠）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杨正泉）

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武健华）

粉碎“四人帮”时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
(孙中范口述 孙劲松整理)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刘明钢）

叶帅与粉碎“四人帮”（王文理）

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时的特殊贡献【节录】
(程振声)

“四人帮”后马天水在上海接受审查（陈锦华）

18 | 读·党史 第18辑



粉碎“四人帮”

江涛/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粉碎“四人帮”

18 | 读·党史
第18辑



粉碎“四人帮”

江 涛/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碎“四人帮”/江涛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1

(读·党史)

ISBN 978-7-5098-2431-3

I. ①粉… II. ①江… III. ①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史料

IV. ①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5450 号

启事:本书选用的部分文字、图片,来源于各正式出版物。其中还有部分作品尚未与有关作者、编者取得联系,我们深感不安。恳请有关权利人联系我社,我们将按《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支付稿酬。
(联系人:贺冬英 电话:010—82517196)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鹏

复 审:吴 江

终 审:赵建忠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增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45mm×210mm 1/32

字 数:116 千字

印 张: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431-3

定 价:1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目 录

CONTENTS

综 述

- 1 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 / 姜浩

回 忆

- 3 毛主席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集团问题 / 吴德

- 48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 张根生

- 149 逮捕“四人帮”的行动和情况 / 汪东兴

- 31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 陈锡联

- 14 我负责一个行动小组抓江青 / 张耀祠

- 105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 杨正泉

- 16 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 / 武健华

- 85 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 / 周启才

- 125 粉碎“四人帮”时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 / 孙中范口述 孙劲松整理

CONTENTS

134 奋战上海200天——忆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央上海工作组 / 郑定铨

74 我们直接参与了抓捕看押“四人帮” / 蒋廷贵 徐金升 黄介元 滕和松 张云生 口述，辛恕翰 姜晓记录整理

▶ 考 证

70 一则重要考订——有关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两个关键时间 / 《李先念传》编写组

100 历史真相与未解之谜——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 / 韩钢

▶ 人 物

6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 / 刘明钢

119 叶帅与粉碎“四人帮” / 王文理

150 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时的特殊贡献（节录） / 程振声

53 向“四人帮”余党夺权——苏振华接管上海 / 丑运洲

35 耿飚在粉碎“四人帮”的日子 / 肖枫

82 粉碎“四人帮”后马天水在上海接受审查 / 陈锦华

▶ 漫 笔

141 从粉碎“四人帮”问题看口述历史的重要性（节录） / 刘静

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 / 姜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于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

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



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

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

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痼疾。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

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毛主席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集团问题

＼吴德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由于毛主席的赞同，党内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诬陷、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时，党的十大也使江青集团的很多骨干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且使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

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来信上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

1974年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批评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他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并且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

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

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之后，毛主席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主席接着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主席指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一次，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内点明了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

第二次是1974年10月，是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的毛主席对他的

指示，毛主席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那时，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1月12日，江青给毛主席写信，提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主席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

（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听劝诫，又托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转达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她提出：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主席报告了江青的意见以后，毛主席一下戳穿，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主席提出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任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任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安排在邓小平之后。毛主席对王海容、唐闻生的

这个谈话，经毛主席批准在政治局传达了。以后我们知道，王洪文去长沙是经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的，他是背着中央政治局的。王洪文向毛主席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王洪文谈后，毛主席当场严厉地批评了他。毛主席对江青的意见和再次批评，点出了江青有野心，制止了江青集团夺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是全国人民和全党克服林彪事件影响以及努力克服其他各种困难的结果，是毛主席稳定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措施的结果。

第三次是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

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5月3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

是毛主席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削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选自《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0年第5期）

华国锋在粉碎 「四人帮」的斗争中

／刘明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掌权伊始就进行殊死的斗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全国人民再一次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则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以为，邓小平已被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打倒，叶剑英靠边站了，华国锋又刚刚上台，政局不稳。这是天赐良机，大权唾手可得。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吊唁期间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王洪文报告。此举意在切断中央政治局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取代党中央的领导。江青想方设法盗窃毛泽东存的文件、材料和手稿，企图加以篡改，作为篡党夺权的依据。“四人帮”及其爪牙指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劝进书”，为江青的上台制造舆

论；同时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在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白卷英雄”张铁生就露骨地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给党中央和人大写过信，没想到主席会去世这么早。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王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截然不同，但起码有差距。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

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有的省有人来信说，他们全省传

达，而不是内部传达，反响很大，二老爷很猖狂。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人心思治，人心思定。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健康力量正在成长、凝聚和壮大。巨大的革命力量卷起的怒潮已经不可阻挡。

华国锋就是在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下，走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并于掌权伊始就不得不与“四人帮”进行殊死的斗争。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住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不久，在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一事。

“四人帮”一致反对，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

会做准备。江青还提出一个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想要控制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华国锋不同意。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毛远新的去留是属于毛主席的家庭事情，别人不愿意听可以走。有些人走了，华国锋只有耐着性子听。马拉松的会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

最后，华国锋问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即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

“这场斗争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步步进逼，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深切地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嚣张，必须做出决断，进行反击。但是，对于能否取得胜利没有把握，于是，他主动与叶剑英等老同志谈话。通过同党内、军内老同志的大量接触，华国锋更清楚地看到了党心、军心、民

心，是向着党内健康力量一边的，从而更坚定了同“四人帮”作斗争并战胜他们的勇气和信心。

9月21日，华国锋听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汇报“四人帮”要动武的情况，更感到形势的严峻。于是，他同汪东兴商量。在此之前，华国锋已经同汪东兴商量过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坚决支持华国锋。

华国锋说：他们这是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搞篡党夺权，怎么办？汪东兴说：他们很可能要搞武装政变，事不宜迟，赶快下决心吧，不然等他们动了手，一切全完了。

华国锋翻开他的笔记本念道：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汪东兴说：既然有主席这个讲话，我们还怕什么！

.....

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刻不容缓。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检查。“四人帮”当时很注意

华国锋的行动，盯得死死的。华国锋甩开了“四人帮”的耳目，马上给李先念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

那时，李先念正在家中养病。华国锋到了李先念的家，一进门就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华国锋说完即匆匆离去。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就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他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

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他认为用开会的办法也许好一些。吴德进一步分析说，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会支持我们，而他们最多只有四票半。再有，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吗？

关于苏共党内斗争的那段历史，他们三人记忆犹新：1957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联合起来要搞掉赫鲁晓夫，他们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多数，赫鲁晓夫是少数。但赫鲁晓夫故意拖延时间，同时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结果，他反败为胜，并将对手打成反党集团。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

华国锋等一起分析了当时党中央成员的情况及力量对比，一致认为，在政治局投票解决“四人帮”是有把握的，但在中央委员会则没

有十分的把握。因此，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他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一致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越早越好”的主张。

这次会议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才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一定要保持首都的稳定”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研究解决“四人帮”的具体办法。当时决定成立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成员，并进行个别谈话而后组织的。

10月2日，华国锋与吴德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华国锋要求吴德仔细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把“四人帮”抓起来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

应，应采取什么对策？二、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还问：“‘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吴德答：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抓起来。

华国锋同意。他特别强调，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就由你负全责。

第二天，他们又一次商量，华国锋说，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师，张春桥的弟弟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有点不放心。他问道：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队伍开往市区，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吴德说：有无把握，我得问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吴德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华国锋听了，让吴德向吴忠打招呼。

华国锋还分别与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苏振华等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并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华国锋要求，一方面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要注意稳住“四人帮”，在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之前，千万不要惊动他们，以免打草惊蛇。

10月3日、4日，华国锋、叶剑英、吴德、汪东兴又反复商讨，再一次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华国锋特别强调一定要保持首都的稳定，做到万无一失。

派遣文武大员占领舆论阵地

就在即将拘捕“四人帮”的关键时刻，华国锋与叶剑英一起研究，决定派耿飚、迟浩田执行特殊的任务——控制中国的新闻传媒。

耿飚后来讲过这件事的缘由，他说：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

赞成。

10月5日，也就是解决“四人帮”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耿飚召去。耿飚到了怀仁堂，两人就谈了起来。华国锋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耿飚已经估计到了，并听到了一些风声，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

耿飚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华国锋还特意叮嘱：“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

耿飚回去后，一直焦急地等待。第二天晚上，华国锋就打电话来了，要耿飚马上到怀仁堂。华国锋和叶剑英一起召见，要他紧

急接管中国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时，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夜晚的不平常经历：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9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卫高同志和你一块儿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

华国锋和叶剑英还派出迟浩